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基金

裕祥B封闭运作5倍初始杠杆，6月2日—6月8日限量首募

裕祥A5月25日一天结束募集

博时快e通 唯一网上直销渠道

博时基金 BOSERA FUNDS 客服热线：95105568 www.bosera.com

基金投资需谨慎

马庆泉 英雄到老皆皈佛

证券时报记者 杨波

“我如
一颗子弹
穿越
十六年
战斗岁月”

人生如白马过隙。已宣布退休离任的前广发基金董事长马庆泉坐在办公室，回味着年少时看过的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这句诗，“小时候以为这是夸张。现在回过头看，60多年的岁月，真的就像一颗子弹那么快地飞过去了”。

马庆泉是中国证券经营机构的第一代掌舵者，基金业的一名老兵。1993年，马庆泉走进了初创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，先后担任广发证券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1998年底参与筹建嘉实基金并担任董事长，2000年初出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，后任副会长。2005年，到广发基金公司工作，任董事长。

走出象牙塔

1949年出生于河南的马庆泉，与共和国同龄，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世沧桑，经历了中国社会跌宕起伏、变化剧烈的60年。

马庆泉早年经历，是一个自强不息年轻人的寻常故事。童年和青少年时期，他的家庭非常贫困：奶奶双目失明、哥哥智力残障、妹妹患脑瘫，全家就靠父亲打零工维持生计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每学期开学，父亲都会到学校申请免交学费。靠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，靠好心人的帮助，他才得以读完高中。

高中毕业，文革中大学停止招生，他走进工厂当上一名车工。1973年，高校恢复招生，家境贫寒、没有任何背景的马庆泉，经过诸多周折，走进了大学校园。大学毕业后，他留校任教，后来继续读书，直到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，分配到中央党校，任经济学教员，后来评定了教授职称。

上世纪80及90年代初的中国，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，各种思潮非常活跃，在北京读书和工作的马庆泉，对从南到北的改革开放之风感受甚深，不再安于呆在学校。“客观上我也不适合当老师，讲过一遍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再讲，在学校时乐于当研究员，写自己的东西。另外，也有经济困难的压力。”

1991年，马庆泉曾在俄罗斯做访问学者，亲历了苏联解体后的休克式疗法。“在前苏联，完全没有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概念，真觉得计划经济是走到头了。我回来后准备写一本关于俄罗期私有化的书，没有出版社接手。”1990年马庆泉去过日本，把前苏联的经济体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作个比较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言自明。

马庆泉终于走出了象牙塔，加入了当年浩浩荡荡的“下海”队伍。导师、同事都挺意外，“他们都说小马是做学问的料，下海可惜了，也不知道行不行啊。我原来的确特别怯场，到公司以后才慢慢锻炼得好一些”。

1993年4月，马庆泉致电他的朋友陈云贤，陈博士当时正在创办广发证券。“陈博士让我过来，坐飞机过来，我那时哪有钱坐飞机啊，陈博士说，公司给报销机票。”因为一开始没有安排住的地方，马庆泉在陈云贤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，“广发证券一开始是广东发展银行的证券营业部。5月初为企业发行股票，那时招股书的编制也没有个规范，是我们像写报告一样编的，印象蛮深。那年秋天的天津会议，上面才出台了一个招股书的格式范本”。后来的工作经历，就是在证券市场和行业协会工作，直到2005年再度出任广发基金董事长。

回忆起18年前第一次南下的经历，“当时，我在办公室工作，在办公室生活，一张长沙发就是我的床铺，过了两三年，我才有了宿舍。那时是充满了改革和创业的激情”。

证券十八载

谈到18年证券生涯，马庆泉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一是每到一个地方都遇到一帮优秀的人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二是做了一些事。事实上，马庆泉有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的业绩：他和广发证券领导团队一起，使这家券商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券商；在广发基金六年，这个公司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实干精神，使该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从2005年初的66.8亿元上升至2010年末的1036.3亿元，增长超过15倍，市场份额连续3年稳定至4%以上，稳居前十大基金管理公司之列。

“其实人都挺渺小的，一生干不了多少事。”马庆泉说。

初创期非常不规范的证券市场，对每一个一线从业人员无疑都是相当严峻的考验，要走过18年的岁月其实并不容易。马庆泉的证券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。

1994年秋，因捍卫公司利益、公家利益，决不通融，马庆泉得罪了几个人，被他们诬陷，几成冤狱。“所幸中央纪委、省高检办案人员认真、明察，深入调查月余，始还我清白。”

1996年沪深争雄时期，市场极度狂热，1997年6月，有关部门认定：海通证券、申银万国证券、广发证券违规操作，造成个别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。马庆泉与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、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一同被免职并记大过。

回忆当年，马庆泉仍在反思：“我们公司的确有不对的地方，一是用自然人的身份证开户做自营，二是买卖某一只股票超过法定限制。虽然当时法律法规不是太明晰，营业部都在使用自然人账户，但这是打擦边球的行为，出了事，作为公司领导，我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。”当时的处理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，新华社发通稿，省市县级的报纸都刊登了，“我当然有压力，但觉得没有私利掺杂其中，还算坦然，但家在北京的中央机关，环境对家里的压力比较大一些”。

马庆泉并没有像很多离任证券公司高管那样从此销声匿迹。离职一个多月以后，马庆泉经有关机构批准，开始管理广发证券的基金业务。当时广发旗下有“广发1号”和“广发2号”两只老基金。马庆泉与基金业的结缘从此开始。

1998年，马庆泉代表广发证券参与嘉实基金筹建工作，出任董事长。2000年，马庆泉离开嘉实基金，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。

2005年，马庆泉二次南下，任广发基金董事长。“1998年管理老基金时，陈博士给了我一本国外10大基金经理谈体会的小册子，当时就种下了转做理财的愿望，后来去了协会，想做基金的念头一直没有断。”虽然另有两家券商向他发出邀请，他还是选择了老东家广发证券旗下的广发基金。

曾经的磨难与波折，在马庆泉都变成了回忆，也已经完全释然，“人生总会有些波折，许多大人物都如此，何况我们小人物啊。”

马庆泉告诉记者，到现在为止，他也不知道买股票怎样操作，也没有哪个亲戚朋友从他这里得到消息去发财。“这么多年来，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，有些底线我会非常严格遵守，外界的诱惑引不起波澜。”

这种定力，在大多数人看起来不可思议，但放下越多，心灵的自由度更大。马庆泉有着世俗生活之上的人生目标，正如他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所说：我会向着完美人生的遥远目标，虽然艰难，但却顽强地迈进，就算进步缓慢，但决不退转。

春雨/摄

也许因为童年时的艰难生活，也许因为职业生涯经历波折，也许因为天生的慧根，马庆泉对佛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，他每天会拿出一点时间研究生命科学与禅修。从2001年5月开始，他每天坚持背诵《金刚经》，多年来没有间断。另外，他还发心读诵了《妙法莲花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心地观经》、《普贤行愿品》等佛典。

潜心学佛

1997年秋，马庆泉曾在成都文殊院谒见了九五高龄的宽霖大师，他还记得宽霖大师当时说：世界上好人多，坏人更多，好人都出家了，谁为百姓做事！

“宽霖大师住世济人的情怀，正是佛家正法真谛。”马庆泉说。

也许因为童年时的艰难生活，也许因为职业生涯经历波折，也许因为天生的慧根，马庆泉对佛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，他每天会拿出一点时间研究生命科学与禅修。从2001年5月开始，他每天坚持背诵《金刚经》，多年来没有间断。

马庆泉最早与佛学结缘是在高中时，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把佛教说成是一种奇怪的、不可索解的、荒谬的学说，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于是很费周折地找到了一本《金刚经》，读了自然是一头雾水，但却很喜欢第32章的四句偈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；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

马庆泉对佛学比较深入的学习，是1993年到广发证券之后。一次去韶关出差，他拜访了南华寺，参拜了六祖真身，了解了六祖惠能一生事迹，深受触动。回广州后，趁节假日，马庆泉陆续访问到六祖的故乡，参谒了国恩寺，以及在穗的光孝寺、六榕寺，开始认真阅读《金刚经》《法宝坛经》以及手头能收集到的佛学文献。

“我对佛学好像天生就有兴趣，可能前世是个和尚吧。”马庆泉微笑着说。工作上遭遇的挫折，也激发起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反思，他开始潜心学佛，发心读诵了《妙法莲花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心地观经》、《普贤行愿品》等佛典。

“我跟《金刚经》似乎有特别的缘分，心里烦的时候，读一读《金刚经》，就可以清静下来。金刚是无坚不摧的意思，六祖惠能就因《金刚经》而悟道。”他表示，“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诵一诵200多字的《心经》，也可以静下心来。这不是迷信，修学佛典，对人的精神修养有很大帮助，对内心世界的建设也有净化作用。”

马庆泉也坚持静坐，“每天静坐一段时间，对强身健体很有效。刚开始打坐的时候确实是妄念纷纷，我的方法是用正念代替妄念，久而久之，脑子里就稍许进入清灵空明的状态，那是很有益的。”

近年来，他对道家也颇有兴趣，“许多道家经典，例如《抱朴子》、钟吕丹道等，体系都非常严谨。好几个道教的祖师如吕纯阳、陈抟、张紫阳都是在60多岁后，有了很多人生经验后觉悟的。”博闻强记的马庆泉，尚能背诵道家经典《黄庭内景经》。“科学研究到了一定的深度，与所谓宗教有相通之处，霍金的东西就接近宗教。”但他说，不可以用世俗的眼光理解东方文化，那是人类智慧的宝珠。释儒道三家，也不可厚此薄彼。不过，说起来，阅读道家典籍，需要更高的鉴别力，如若先读些佛学的东西再读道家，可能更稳妥。

已逾耳顺之年的马庆泉非常平和，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智慧，隐藏在他平淡的外表下。谈佛论道娓娓道来、绵绵不绝的马庆泉，已不愿再谈论基金行业证券行业的问题，他总是微笑着说：你还是去问林总（广发基金总经理）吧。也许真的是：英雄到老皆皈佛，宿将还山不论兵。

笃信因果的马庆泉相信：“人善人欺天不欺”。佛教讲因果，最终的结果，也许已定格在起心动念的一刹那间，“要有好的果，就要种善的因”。

所有打擦边球的事都不能做

马庆泉18年证券生涯的经验教训是，“所有打擦边球的事都不能做”。从管理老基金开始，他特别注重法律法规。

在马庆泉看来，金融企业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自我约束机制，将公司的约束机制变成铁律，这是金融企业真正的生命力。“要绝对讲诚信，有了大家的认同，长期坚持下去一定能发展起来，靠混水摸鱼，赚一把就走，不可能在这个领域长期生存下去，更谈不上发展。”

对于目前尚未纳入监管体系的私募基金，马庆泉表示：“外部没人管，自己一定要管好，一定要把公司自我的道德约束提到首位，在道德约束、自我约束上甚至要比公募更严。”

对于退休后的去向，马庆泉表示正在考虑中，也许会跟朋友一起组建公司。“如果组建公司，我会要求员工在二级市场的投资必须由公司统一运作，个人不能买卖股票。一定要一开始把制度设计好，如果没有严格的自我约束机制，就不要走这条路。”马庆泉表示，也许会考虑成立一家全员持股的公司，让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一致，“我曾到加拿大、美国访问，许多知名机构都是全员持股，它们的生命力就在于全员持股。”当然，缘起性空，一切看机缘，他也很有可能什么也不做了，若是如此，上面的话就是他对朋友们的谏言。

在马庆泉看来，制度与文化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，“光有软约束不行，一定要有硬约束，要有条条框框。在买卖股票的限制、内幕交易的限制方面，私募和PE机构，也必须要有自己的、自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

走出生命的迷局

不久前，看到一位业内人士的微博：证券行业带给大家生活的富足和巨大的压力，让人痴迷让人疲惫，需要多大的智慧才能跳出这个迷局？

在浮躁的证券市场、浮躁的基金业，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观？

在马庆泉看来，金融行业的人总在跟钱打交道，要有正确的金钱观才不迷航。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有本书叫《千悔无门》，讲的是一个人在抛弃了自己的义务，失去灵魂支柱时，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对他而言，也不过是一屋子待泼的脏水。”

在广发基金每次年终总结会、新员工培训会上，马庆泉都会反复强调，应该怎么做人，应该有怎样的财富观，怎么看待人生的价值，怎么回报社会。

在董事长致辞中，马庆泉写道：“一个企业的兴旺发达，首先源于其企业文化的兴盛；而一个企业的衰败，首先也是源于其企业文化的解体和变质。”

早在广发证券负责投行业务时，马庆泉就曾定下一个规矩：搞一个投行项目，就在当地办一所希望小学。“1997年被宣布免职的那天，我正在重庆永川给希望小学剪彩。”据介绍，广发基金每年在公益事业上也都有投入，2006年以来公司直接捐款800多万，还通过广发证券捐款1000万。“我们必须懂得感恩与珍惜。”多年来，他一直在广发基金倡导感恩文化。

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会更需要精神的营养，马庆泉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多学习东方文化，“东方文化让人放松精神，平衡心态，还有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操作的方法，比如禅修、静坐、太极，都有益身心。”

马庆泉还向大家推荐南怀瑾老先生的书，“像我们古文底子差一些的，南老先生的书看起来不费劲。有一些人生的大道理，对我们日常生活工作都有所启发，如果自己在修学，还可在他的书里找到修行的法门。“净慧、星云大师的书，也都很有益”。

对未来有信心

小时候，热爱文学的马庆泉想当作家，他的家乡出过像姚雪垠、二月河一样的文学家。上大学以后想当理论家。“结果，作家没当成，理论家做了一半，没有股权的企业家也做了一半，就已到退休的时候。”马庆泉半开玩笑地说。

身在喧嚣的资本市场，马庆泉没有放弃对写作的热爱，也没有忘记当理论家的梦想。2003年，身为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的马庆泉利用春节假期，突击写了一本探索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小册子——《新资本论纲要》。该书以马庆泉自己和马克思对话的形式，总结了多年的思考，对知识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了深入阐述，无论对理论的探索还是在写作形式上都匠心独具。

“知识经济社会存在着知识、劳动、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，及其相对应的三个基本的社会阶级。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价值是由那些要素创造的，再确定所对应的社会阶级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，才会有明确的和谐社会蓝图。”谈起理论，马庆泉仍然津津乐道。

早在1989年，马庆泉曾发表专著《新短缺经济学》，当时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，短缺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。他有预见性地提出中国短缺经济时代将要结束。五六年之后，“短缺”真的从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完全消失了。马庆泉下海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《我的市场经济观》，被收录进《中青年经济学家文集》。另外，他还主编过《中国证券史》等书。

学经济出身的马庆泉，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无保留地乐观。“1991年，我在俄罗斯往家里打电话，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排队等了一夜，好不容易那边的总机给拨通了，国内的总机却听不懂俄语，给挂断了。现在，全世界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。”他认为，今后30~50年将是中华民族比较扬眉吐气的时期，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、文化观念也会出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。“虽然当下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但会在发展中改变，美国早期西部开发时，比我们现在更乱。我们应该对未来有信心。”